

■ 学术聚焦

# 高等教育学学科属性刍议

孙 凯

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与“领域”之争是一个久争不决的问题。从学科的本源判断，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合法性来源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特殊性。作为教育活动的特殊组成部分，高等教育活动具有一些传统教育学无法解释的特殊问题和特殊规律。那么，作为研究高等教育活动特殊问题与特殊规律的学科，高等教育学应当成为教育学的组成部分。<sup>[1]</sup>在这个高等教育学学科属性的争议焦点，集中在如何判断当前学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学理问题。比如，高等教育学能否建立一套比较成熟的学科理论体系，以及高等教育学是否具备独特的研究范式或研究方法。如果以这两方面问题为标准，那么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尚不成熟。实际上，即使对传统上比较成熟的社会学科而言，学科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及其解释力也一直面临质疑。所不同的是，作为一门初创的本土学科，高等教育学在学科体系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即面临学术属性的质疑，则更容易导致未来学科发展道路上的分歧与偏向。

## 一、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建设的基本轨迹

一门学科的出现需以社会的现实需要为基础。某种意义上，学科可以被看做一种基于社会发展需要而形成的知识分类体系。学科体系的成熟是人们对某类社会现象认识不断深入的结果。当一门新学科能够解决原有学科不能解决的问题时，它便具备了充分的学术合法性。

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走学科建制的道路有其时代背景。“30年来的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我们必须总结经验，从理论高度来解决，分清哪些是‘左’的东西，哪些是正确的东西。”<sup>[2]</sup>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发展需要与相关理论研究的缺乏是我国高等教育学出现的动因。在缺乏高等教育发展“基本常识”的前提下，高等教育研究者很难走领域研究的道路，通过对具体问题的选择和研究实现对高等教育活动整体规律的把握。另一方面，至少在当时来看，我们也无法基于已有的学科理论来指导高等教育实践。可以说，走学科建制的道路，首先在理论建设层面丰富我们对高等教育规律的基本认识，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必然。实际上，这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学不能走“领域”研究道路的原因所在。

一般认为，是否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一门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准。对于走学科建制道路的高等教育学而言，“以构建明确的学科体系作为明确的目标指向，恰恰是我

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特殊性。”<sup>[3]</sup> 与传统学科不同，高等教育学是在首先获得学科建制之后，再逐步开展学科理论体系的建设，造成了学术建制与学术认同间的落差，使得“在学术同行心目中，甚至在本学科的许多研究者心目中，高等教育学距离一门真正成熟的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sup>[4]</sup> 学科理论体系的不成熟造成了高等教育学学科未来发展的某种不确定性。倘若对学科理论体系建设持一种不乐观的态度，即认为我们不太可能构建一套完整的、对高等教育活动具备广泛解释力的理论体系，那么高等教育学只能成为其他学科研究高等教育现象的平台而丧失其学理上独立的学科地位。反之，倘若对学科理论体系建设抱乐观态度，则高等教育学必然经历一个逐步成熟的蜕变过程，最终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可以看出，对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未来发展的判断差异，是“学科”与“领域”争论的一个焦点。

针对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问题，我国学者曾做过多次不同层面的尝试。以1984年第一本《高等教育学》出现为标志，我国学者对高等教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如高等教育的内涵与外延、高等教育的本质与功能、高等学校的基本职能和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今天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基础。从学科理论体系构建的思路来看，这一时期大致遵循这样一条路线，即：明确研究对象——确定学科逻辑起点——衍生基本概念——形成逻辑关系——构建理论体系，最终通过“对无限丰富的、具体的因而也是个别的教育现象加以全面、完整和深刻的分析综合、去伪存真”，形成一套“对任何教育实践都具有普遍认识价值”的理论体系。<sup>[5]</sup>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建设基本以教育学为蓝本，在理论体系构建取向上力图以概念明确和逻辑清晰为最终目标。

近年来，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建设出现了新的变化，“从当初对逻辑起点的探讨、理论体系的构建到今天对多学科研究的强调。”<sup>[6]</sup> 高等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建设不再以寻找逻辑起点和构建单一体系为主流，代之以学科边界的开放和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试图通过不同学科在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上的差异来多维度剖析高等教育领域的诸多现象。其中，尤以伯顿·克拉克主编的《高等教育的观点：八个学科的比较观念》对我国高等教育学界研究思路的影响为巨。其后，潘懋元教授主编的《多学科观点的教育研究》一书，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学走多学科发展道路的重要标志。同时，多学科研究的兴起，对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理论建设带来了变化。首先，对理论体系的认识趋于复杂，学科边界逐渐模糊。作为研究对象的高等教育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单纯的教育现象，而是成为一个“复杂的、多层结构的开放系统”，<sup>[7]</sup> 多学科研究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也将成为跨学科的产物，从而在逻辑起点和概念上不得不出让让步。其次，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开始向多学科转移，从而在学科方法标准上持开放的态度，“既要横看，看到它的逶迤壮观，又要侧看，看到它的千仞雄姿；既要入山探宝，洞悉其中奥秘，又要走出山外，遥望它的全貌。”<sup>[8]</sup>

多学科研究引发了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建设的新问题。在方法论层面，多学科方法

加大了高等教育学在研究方法上的整合难度，使高等教育研究趋于分散，进而加大了构建知识体系的难度。高等教育学的多学科构建，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两方面容易陷入“无政府主义”境地。本文认为，多学科研究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来源与我国高等教育学与国外，尤其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研究的交流与融合。与早期试图以教育学为基础，试图构建清晰的学科理论体系不同，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建设已经极大的复杂化。对高等教育学科属性的争论焦点，逐步转移到如何看待多学科方法，以及独特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能否作为学科标准问题上来。一种观点认为，在多学科背景下，高等教育学不再可能发展独特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作为研究领域的特点越来越明显。即使对于认同多学科方法的学者而言，构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难度无疑也加大了。在某种程度上，高等教育研究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兴起，包括高等教育学复杂理论体系的主张，实际上是学科建设与领域研究之间的一种融合和妥协。

## 二、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属性的若干问题

高等教育学是一门新兴的本土学科。从学科发展史角度看，我国社会科学体系是伴随着西方知识结构的引入而同时发展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特殊性在于，它一方面诞生于本土需求和实践，同时又必需在传统学科体系中获得认同。实际上，当我们判断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属性时，必需首先明确这个特殊背景，以及明确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承认它是一门怎样的学科。

现代意义上社会科学发轫于19世纪。以自然科学建制为先导，“人们试图在经验发现（与“思辨”相对而言）的基础上确保并推进关于‘实在’的‘客观’知识，社会科学领域中多学科的创立便是这项工作的一部分。”<sup>[9]</sup>在一次大战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人类学首先获得了普遍认同的学科地位。其后，尤其是二战后的一段时间，随着大学在世界范围的扩张，大量学科以大学系科为载体，呈现出学科繁荣的景象。但由于知识分化所带来的学科壁垒不断遭到质疑，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成为新的趋势，学科间的界限也逐渐模糊。可见，学科本身就是一种基于某种社会需要而形成的知识分类体系。在特定时期，知识分类即可能走向分化，推动新学科层出不穷，也可能走向整合，表现为学科数量的减少。

所谓判断学科属性的标准，实际上是对原有学科特性的后验认识，而推动学科诞生和发展的真正动力，来源于特定社会需求背景下的人类普遍认识。我们不应当依照原有学科的某种特性来判断新生学科的学科属性。比如，19世纪，人们普遍将社会划分为经济、政治和社会三大结构，而这种普遍认识就成为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诞生的基础。再如，当前我们判断高等教育学学科属性的“三标准”，实际上来源于对传统学科特性的抽象总结。在跨学科的时代背景下，如果严格按照“三标准”来衡量，恐怕还没有哪个学科能够获得真正的学科地位。

影响高等教育学学术属性的还有学科的本土标准与国际认同问题。如前所述，高

等教育学是我国的本土学科。并且，当前仅有前苏联和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走的是学科建制道路，而前苏联的学科体系比较简单。这不仅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即使从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进程来看也是鲜见的。对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脉络分析，社会科学构成及知识结构基本上是西方引进结果。我们极少在学科建制上“敢为天下先”。长期以来，中国在学科建设上对西方的亦步亦趋，“形成了西方社会科学有关学科分类的一系列理论预设在中国学术场域中的正当性。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过程中，隐含于学科结构背后的西方社会科学观，为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设定了相应的规则。”<sup>[10]</sup> 学科建制的话语权，往往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也就是说，当前学科标准中强调研究方法的确定性、实证化、科学化，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西方学术建制标准的外在表达。

在中国社会科学尚处于世界学术体系边缘地带的时期，高等教育学确实在学科理论建制上难以达到高深的学术标准。尤其是在世界范围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以西方学术体系为标准，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高等教育领域研究，必然会对我国原有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产生冲击。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也必然面临两方面的压力：其一是来自于国内其它社会科学对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的质疑；其二是来自于国外高等教育研究同行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等问题上的冲击。

### 三、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任务与道路

高等教育学科属性争论的真正价值，不应简单归于在学科问题上“是”与“非”的判断。如前文所述，造成高等教育学学科属性久争未决的原因，既有理论体系建设不成熟的学科内部因素，也存在外部对学科认识差异问题。在我们对学科本身的认识尚不明晰的情况下，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属性的判断难免掺入学科感情和对未来学科发展主观预测的因素。本文认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道路与领域道路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面对复杂的高等教育现象。领域研究与学科建制在解决高等教育应用研究上存在很大的交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高等教育领域研究，也不应忽略对教育理论问题的探讨。所不同的是，相比领域道路而言，学科建制道路更加强调理论体系的构建。本文认为，高等教育学科属性的发展是一个按照学术逻辑自然演进的过程，学科建制与领域研究可能最终将走向融合。

现阶段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主要面临两方面的问题。首先，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仍然不能适应迅速发展的高等教育实践。尤其是扩招以来，高等教育理论的建设滞后的现象更加严重，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比如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辩证认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高校教学资源的配置原则等多方面上缺乏研究共识，也很难用于指导实践问题。其中既有人们对高等教育自身认识局限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理论研究仍以旧有认识和经验为主，与实际脱离的问题。其次，在多学科研究背景下，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有待整合，不能陷入方法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一门

学科研究方法的“多学科”定义，容易在研究内容上“广而不深”，造成学科研究的可替代性和非独立性，从而丧失一门学科的独特视野。研究者应统合“各异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共同的高等教育问题”，形成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独特方法论优势，能够“见人所未见”，而不是各学科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各自为战。只有将高等教育中的同一问题运用多学科方法加以研究，才是真正的“横看成岭侧成峰”。<sup>[11]</sup>

高等教育学仍然是一门尚未成熟的学科。言其不成熟，并不是因为不符合任何人为设定的学术标准，而是由于它在对高等教育活动规律的理论认识上尚有较大差距，在现实高等教育实践过程中依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指导价值，在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制订过程中，以及在高校办学实践过程中的话语权仍然不足。只有当理论体系实现从经验体系向知识体系的转变，能够在高等教育活动认识不断深入的基础上对教育发展的现实问题做出科学化的表达，高等教育学才能够真正在学理上实现学术建制，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

#### 注释：

- [1] 潘懋元. 必需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J]. 厦门大学学报,1978,(4).
- [2] 潘懋元. 关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几个问题[J]. 高教研究,1982,(1).
- [3] 胡建华. 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特殊性分析[J]. 教育研究,2003,(12):15.
- [4] 王建华. 高等教育学的演进——学科制度的视角[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2):39.
- [5] 方展画. 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若干理论思考[J]. 高等教育研究1996,(3):24.
- [6] 王建华. 多学科研究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J]. 高等教育研究,2003,(3):89.
- [7] 刘小强. 独特对象 独特方法——关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思考[J]. 江苏高教,2007,(1):13.
- [8] 潘懋元. 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3.
- [9] (美)伊曼纽尔·华勒斯坦, 等. 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M]. 刘锋,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5.
- [10] 郑莱. 一谈学科的迷思[J]. 读书,1998,(2):109.
- [11] 王建华. 多学科研究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J]. 高等教育研究,2003,(3):105.

---

作者简介：孙 凯，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卢彩晨

责任校对：卢彩晨

---